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跨越边界

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

亨利·A·吉罗克斯 著
刘惠珍 张弛 黄宇红 译
张斌贤 审校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亨利·A·吉罗克斯 著
刘惠珍 张弛 黄宇红 译
张斌贤 审校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美)亨利·A·吉罗克斯著；刘惠珍、张弛、黄宇红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ISBN 7 - 5617 - 3034 - 9

I. 跨... II. ①亨...②刘... III. 教育政治学
IV. G40 - 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185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

著 者 亨利·A·吉罗克斯
译 者 刘惠珍 张弛 黄宇红
审 校 张斌贤
责任编辑 张 玲 金 勇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 - 62865537
传真 021 - 62860410

[http : //www. ecnupress. com. 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6 开
印 张 22.2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 - 5617 - 3034 - 9 / G · 1535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Border Crossings

By Henry A. Giroux

Copyright © 1992 by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arrangement with Taylor & Franci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01 - 120 号

本书献给

我的父母

和我的第一位教师詹姆斯·鲍德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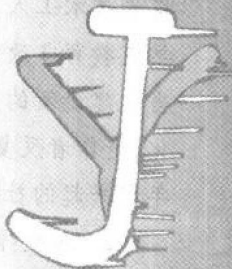
译者序

// 译者序

本书作者亨利·吉罗克斯(Henry A. Giroux)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激进(或激进主义)教育学派的重要代表。1969年到1975年期间,吉罗克斯曾担任过中学教师;1977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课程理论、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其后先后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和塔夫斯大学。从1983年开始,他任教于俄亥俄州牛津城的迈阿密大学教育和相关专业学院,并担任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现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特伯雷中等教育讲座(the Waterbury Chair in Secondary Education)教授。此外,他还是波士顿大学《教育学期刊》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和《课程探索》的特约编辑。

吉罗克斯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文化和学校教育过程》(1981)、《教育在包围之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学校教育的辩论》(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合作,1983)、《教育的理论和抵抗》(1985)、《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对学习的批判教育学》(1988)、《学校教育和为公众生活而斗争:现代的批判教育学》(1988)。这五本被美国教育研究会(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列为其出版物中教育方面最有影响的书籍。他的其他作品包括:《作为后现代批判实践的课程论文》(1990)、《后现代教育:政治学、文化的和社会批判主义》(1991)(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合作)。

吉罗克斯先后主编的书籍包括:《批判教育学、国家和文化斗争》[与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合作,1989]、《流行文化、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与罗杰·西蒙(Roger Simon)合作,1989]、《大众文化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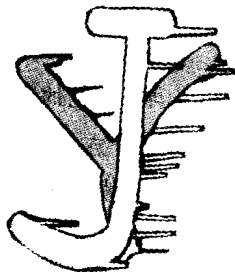
批判教育学》(与罗杰·西蒙合作,1989)、《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政治学:重新思考教育边界》(1991)。此外,他还是伯金与加维出版社(Bergin and Garvey Press)出版的丛书《教育的批判研究》(与弗莱雷合编)的合作主编,是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 Press)出版的丛书《教师授权和学校改革》(与彼得·麦克拉伦合编)的合作主编。除上述著作之外,吉罗克斯还先后发表了150多篇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

对于我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阅读本书将会是一种奇特的经历。这不仅是因为作者的语言非常晦涩、甚至“奇异”(这一点,作者在导言中也作了某种说明),更主要的是,它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我们曾经接触过的许多教育理论著作(包括美国学者的著作)。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本书试图开阔我们如何思考学校教育、教育、教育学和文化政治学的思路。为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试图摆脱关于如何编写和阅读此类书籍的传统的条条框框。”在书中,作者运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教育界流行的各种思潮(进步主义、现代主义、批判教育学、新保守主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以便对学校、学校教育、教育、教育学进行重新思考。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头绪非常繁多。这确实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当然首先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这确实也是一种极为有益的智力挑战。

本书是作者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汇编。在书中,作者主要阐明了以下观点:

1. 对教育功能的重新认识。作者反对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的、主要由新保守主义倡导的教育功能观,反对把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培养技术工人、促进工业化以及传递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反对把学校教育非政治化,主张教育应当努力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应当在建设新的、批判的民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功能的政治化,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基本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想比193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义更为激进。

2. 对教师工作的重新认识。作者认为,教师并不只是已有种族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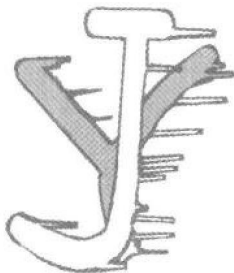
验的传递者,而是知识分子,是文化工作者。教师应当敢于承认自己坚持的价值观,并与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积极投身到建设批判民主的广泛社会斗争中。因此,作者批判美国教师教育中过于注重对教师的技术训练,而忽视教师的价值倾向。

3. 对课程的重新认识。作者反对把学校当成传递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场所,反对以精英文化压制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统一性,强调文化的多元化、异质性,认为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原有学校课程,排斥了女性、少数民族(种族)等另类的经验、体验、故事、历史,排斥了学生的个人经验。他主张重新认识这些“另类”经验的价值,并使之在学校课程中赢得应有的地位。

4. 关于边界教育学的论述。边界教育学(Border Pedagogy)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的重要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吉罗克斯与其他激进教育家存在明显差异的根本所在。按照吉罗克斯本人的说法,边界教育学反对学科领域之间、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间、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知识(课程)与学生经验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权力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的固定不变的界限,承认并积极推动这些界限的变化。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教育和教育学,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批判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从而成为有勇气的公民。

校读全书,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畸形的“教育政治化”之后,中国教育界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经济主义盛行,“数量”、“效益”、“效率”成为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所有方面(从理论研究到教育教学改革,从学校管理到学生评价)的主导价值观。近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着本来不可避免的对教育的政治学探讨。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终极真理,因而不须再劳力费神,还是我们缺乏正视这种问题的勇气?是因为我国教育中已不存在进行政治学探讨的问题,还是由于短视阻碍了我们的行动?读完吉罗克斯的这部充满着咄咄逼人的政治火药味的教育著作,我们确实应当对我国教育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取向进行反思。

在本书中文译本即将付梓之前,我想对参加这项艰难的翻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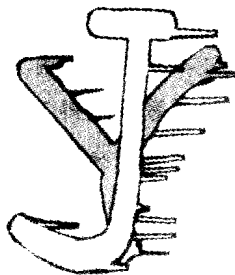
的刘惠珍博士、张弛、黄宇红和宋虎平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金勇先生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宽容,我可能难以坚持把这项工作做完。

本书从翻译到初校、再校,历时两年。由于我们对美国激进教育理论、特别是吉罗克斯理论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还不够全面、深入,书中必然存在不少问题,恳请方家指正。

张斌贤

2002年8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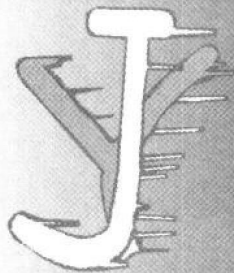
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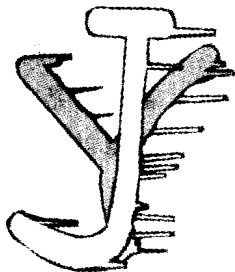
鸣谢

// 鸣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许多人那里得到了大量智力的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在这里很难一一提及。但是,我还是想向我的妻子和朋友珍妮·布兰迪(Jeanne Brady)表示感谢,感谢她所给予的理智的忠告、耐心和道德支持。感谢我的同事们,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罗杰·I·西蒙(Roger I. Simon)、理查得·宽兹(Richard Quantz)、丹尼斯·卡尔森(Dannis Carlson)、拉里·格罗斯伯里(Larry Grossberg)、唐纳多·麦瑟多(Donaldo Macedo)、坎迪·米切尔(Candy Mitchell)、哈维·肯耶(Harvey Kaye)、史丹利·阿诺威兹(Stanley Aronowitz)、罗夫·培基(Ralph Page)和戴维·特伦德(David Trend)等人的各种观点。这一切,促使我对本书所论及内容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马丁·奥尼尔(Martin O'Neill)、珍妮·布兰迪、昂纳·范甘(Honor Fagan)、艾德里安娜·赫兰德兹(Adriana Hernandez)、斯蒂文·赫默斯(Steven Haymes),也是本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的不竭源泉。我还要感谢我在1990年秋天在安大略教育研究所所教的研究生们,他们关于后殖民理论政治学与教育学的观点,以及关于身份政治学的洞见,使我受益匪浅。特别要感谢马丁·奥尼尔,他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教材和文字材料。如果没有他的心血、帮助和支持,我就难以完成本书。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鲁特利吉出版社的杰因·M·法格罗里(Jayne M. Fagnoli),他激励我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写作,他的见识与宽宏是一种不懈的支持。



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过去已经以其他形式发表过，在这里，我还要对那些允许使用下列资料的出版商表示感谢：本书第一章首次在《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Education)第170期(1989年)上发表，这篇文章是对刊登在《公民学科评论》(Civic Arts Review)第1卷第1期(1988年夏)上的一篇访谈稍作修订获准重新发表的。第三章最早分别发表在西彻斯特大学的《学院文献》(College Literature)第17期(总177期)和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后现代主义、女权运动和文化政治学》(Postmodernism, Femin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1991年)上。第四章最早刊登在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第89期(1990年)上。第五章是《后现代主义、女权运动和文化政治学》(1991年)一书中的一篇论文的缩写。第九章的内容最初发表在《揭秘》(Exposure)上。第五章中的访谈曾发表在《后象》(Afterimage)杂志第18期(1990年)。第八章和第十章的许多论述曾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上发表。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目

录

总 序	1
译者序	1
鸣 谢	1
导 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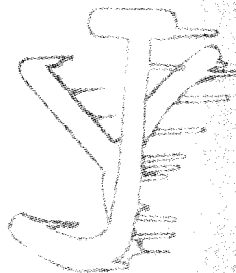
第一编 学校教育与文化政治学

第一章 激进教育的希望——与亨利·吉罗克斯的对话	9
第二章 后殖民冲突与民主的可能性	22
第三章 跨越教育话语的边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	46
第四章 离开标准的中心：重新确定学科和教育的边界	107
第五章 重新界定种族与种族关系的界限——超越多元主义政治学	133

第二编 文化工作者与文化教育学

第六章 批判教育学和文化权力——对亨利·吉罗克斯的访谈 ..	183
第七章 文化研究、拒绝差异和批判教育学的复归	198
第八章 通俗文化：一种愉悦和意义的教育——身体的解放	221
第九章 利昂·戈卢布激进的悲观主义——走向表现的批判教育学	256
第十章 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政治教育学：对帝国主义的笔伐	286

索 引	312
-----------	-----



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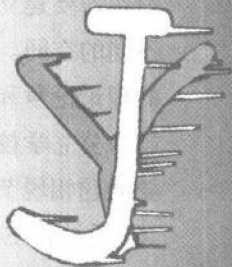
言

导言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反映了我的政治学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转向。在过去十几年里,我的大部分著述一直集中在对学校教育的探讨。在这个范围内,我的重点是在关于教师教育、公立学校、高等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某些方面改革的政治学研究方面。尽管我仍然相信,上述这些问题对于激励学生被教育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即能够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主体(political subjects)——甚为关键,但是,我不再认为围绕着教育的斗争仅限于上述这些问题就可以了,我也不再认为作为政治、道德和社会生产的一种形式,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学校事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曾经相信学校单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改造社会的观点。我从来没有相信或者支持过这种观点。但是,我之所以仍然把我的政治学和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是因为我相信它们值得关注。

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争论教育学院和公立学校教育是否能够成为更大范围社会改革的机构的时候,我却大大低估了结构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力,在这种强制下,教师工会和流行的保守主义观点对美国绝大多数教育学院的课程和主张发挥着塑造作用。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是使我关于学校和教育的理论分析有所改变的唯一因素。

由于里根-布什时代联邦与州教育政策的无情打击而引发的混乱,在最近十年里,许多进步主义教育家和批判教育家们,成了他们自己最坏的敌人。由于不能在教育界内外形成建设性的同盟,由于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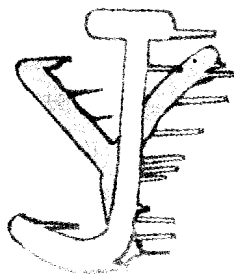


把社会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当作一种开放新的教育空间的有希望的可能性，新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分离主义的出现，导致了批判教育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力的大幅下降。

除个别例外，激进的和批判的教育家通常都对社会理论中的巨大变化毫无察觉，这样的变化在其他领域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许多批判教育家总是喜欢把自己圈在传统的学科界限内，在陈规中周旋，他们宁愿纠缠于了无生趣的学术会议，也不愿意去接近那个充满着对民主、社会和学校真实威胁的外部世界。我也目睹了在美国为数不少的教育家中，正在兴起一种反理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这种思潮只是简单地提出了对“真正的”实践、通俗的语言和基层政治的呼唤。就其本身而言，这些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它们通常或者转化成一种对解决实际问题方法的自我欣赏的呼唤，或者变成一种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避。在一些情形下，教育批评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对经验的粗陋的称颂，这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二元矛盾重新复活。在这种情形下，理论要么成了对教育改革无足轻重的东西，要么成了对教育工作者鲜有助益的学究们的说教。 2

过去的十年，我同样目睹了各种形式的教育批评的出现，它们是对同仁的不折不扣的卑鄙攻讦，这种攻讦更接近于麦卡锡时代的风气，而不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对话和集体斗争的政治，而恰恰正是这些，才是当今教育领域迫切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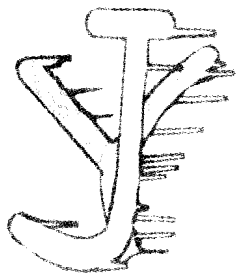
当今的各种批判的教育理论视界非常狭窄，虽然接受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开阔起来。正是它们使教育界思想僵化，异常闭塞。为了改变学校，进而改变广泛的社会秩序，批判的教育理论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联系，采用新的范例，通过寻觅到新的盟友而开拓不同的空间。大多数的教育刊物已经对许多其他学术领域中出现的理论论争和新的学术观点，表现得十分迟钝，其结果就是它们越来越与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种种主要问题以及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相脱节。而理论对现实的真正的反应却是在别的领域。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以及艺术中的广泛



运动,正在文化差异的政治学框架中提出教育问题,这让一个正在堕落的领域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样的理论家有科内尔·威斯特 (Cornel West)、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钱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拉里·格罗斯伯里 (Larry Grossbery)、加亚特里·C·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等等,他们对批判教育学的含义和文化政治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由于拒绝把概念变成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实践,他们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崭新的工作,一直采用了政治和文化生产的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知识建构、主观性和社会关系。在使教育远远摆脱非历史化的、非理论性的实践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文化工作者们都在试图将教育实践变为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无论在学术界内外,这都意味着更加注重对意义的产生及其表现的分析,以及对这些实践及其结果对社会权力运行的影响的分析。

本书试图开阔我们如何思考学校教育、教育、教育学和文化政治学的思路。为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试图摆脱关于如何编写和阅读此类书籍的传统的条条框框。例如,本书的每一章都有各自的研究视角,因而,能够独立于其他章节阅读——尽管第二章有些例外,它 **3** 为本书其他章节提供了理论架构。不仅如此,本书还试图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它将提出全新的问题、全新的分析和全新的道德阐述的形式。对于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我并无歉疚之意。我相信,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以重新搭建开展文化和教育论争的平台,是当今一项既迫切又重要的任务。我非常同意埃内斯托·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的观点,他关于采用新的话语的见解非常深刻。他写道:

严重的认识论的断裂不会出现在对老问题采用新的解决方法的时候,但会出现在由于激烈的论争而使老问题失去自身的意义的时候。如果人们希望推动政治争论,那么,对于我来讲,前者是很关键的……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和一种全新语言表述方式……新的目标、新的问题、新的价值,形成建立一种新的对抗性和新的斗争形式的可能性,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¹



当然，语言的产生和运用不能脱离读者；社会上有许多的读者群体，而书籍由不同的读者阅读，情形是绝对不同的，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被理解。为防止被误解，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从来都认为教师们“太笨”，以至于读不懂理论书籍。我说的是那些深受低估和损害大多数教师基本智力的“前卫人士”毒害的批评家们，他们声称自己能够阅读理论文献，而那些公立学校的教师们或者太忙或者没有能力涉足批评话语。

我还想到，许多人都抱怨说，一篇理论文章应当能够直接地与提供课堂教学实践的特殊形式相联系。对这种观点的驳斥，需要通过教育实际是什么和做什么的广泛考察。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确实，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重新解释教育本身的含义。这就意味着教育是一种文本的、文字的和可见的实践的结构，它探索人们认识自身的过程和认识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方式。它承认那些出现在社会文化生产各个领域中的符号形式，表现了相互对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形式，教育受知识、欲望、价值和社会实践的建构的影响。由此，引发出一个概念，即教育能够争夺符号生产的主导形式。用罗杰·西蒙 (Roger Simon) 的话来说就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既在争夺也在复制着各种形式的图像、文字、谈话和行动的结构、表现与具体实施。²这就形成了教育的新的含义，它让文化工作者、教师和学生知道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群体的未来。

正如这里描述的那样，教育与其说是提供一整套普遍性的规则，不如说是作为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它重新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意味着对教育理论与其赖以发展的环境的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重视。教育理论并非历史上特定的主体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所进行的特殊实践的替代品。相反，它是一种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散漫的实践和未完成的语言，它来自于不同的实践与语言环境。它为教师和其他人提供新的范畴、事例和见识，并对从学校教育的目的、意义到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扮演的角色等所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它的特殊性和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提供了一种语言，凭此切断

4

